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双因素影响分析

李元旭 姚明晖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以2006~2010年为样本区间, 研究了文化双因素对中国FDI的流量及存量的影响, 在文化距离维度方面分别考虑了Hofstede文化维度和GLOBE文化维度。结果发现FDI流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不显著相关, 与GLOBE文化距离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FDI存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和GLOBE文化距离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FDI流量和存量与文化相似度在两种情况下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研究表明, 从更全面的文化因素视角看, GLOBE文化维度相比于Hofstede文化维度在研究FDI中更为全面和适用, 而且文化相似度与文化距离相比对中国FDI的影响意义更大。

关键词: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距离; 文化相似度

中图分类号: F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14) 05-0076-11

1978年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中国经济日益融合到全球经济浪潮中。2001年, 中国加入WTO, 在大规模吸引外资的同时, 也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2010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 同比增长21.7%, 由图1可以看出, 连续9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年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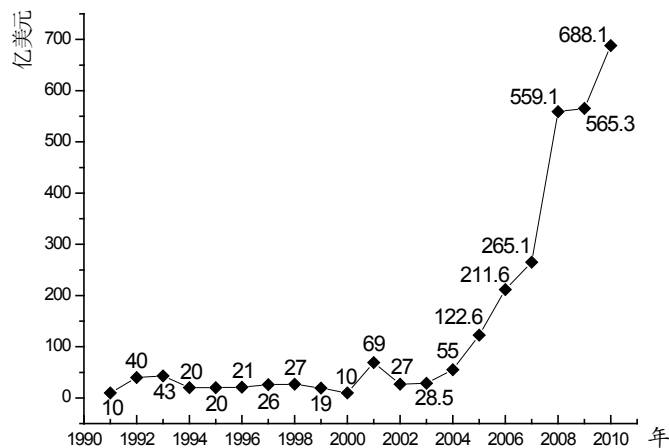


图1 1991~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收稿日期: 2013-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层面及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12&ZD024)、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支持体系的理论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11SHKXZD006)和“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2012SHKXYB002)。

作者简介: 李元旭, 男, 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商务、战略管理; 姚明晖, 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

增速达49.9%。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学术界开始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国际化路径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样本数据相对比较陈旧,大多采用2002年以前的数据,但在2002~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现有文献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对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一国文化不仅在资本结构上而且在群体绩效上,都对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本文全面考虑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影响因素,即文化距离与文化相似性,旨在研究两者对中国OFDI的影响程度与差异,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相似性相比于文化距离对中国的OFDI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完善了中国OFDI的文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研究,为国际商务活动领域研究文化维度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在国际商务领域,对文化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文化差异性即文化距离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文化距离的测量大都采用Hofstede (1980)的文化维度,并且对于两者的关系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得出两者呈负相关的结论,如Li和Guisinger (1992)、Flores和Aguilera (2007)、田晖和蒋辰春 (2012)。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不相关,如Benito和Gripsrud (1992)、Loree和Guisinger (1995)。也有学者得出两者呈正相关的结论,如Thomas和Grosse (2001)、Randøy和Dibrell (2002)。上述研究都着重分析FDI影响因素,文化距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对其进行的分析比较简单,并且涉及中国样本的研究也较少。

文化相似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文献比较少,Buckley等(2007)运用中国官方1984~2001年的对外投资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的OFDI与文化相似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张宏和王建 (2009)运用2007年114个东道国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中国OFDI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的OFDI与双方的文化联系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多数文献都将文化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但却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在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Hofstede的文化维度是否依然适用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采用Hofstede和GLOBE两种文化距离维度,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期2006~20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和文化相似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 文化距离

对于文化距离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假设,即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提升了进入成本,降低了营业利润,阻碍了公司将核心竞争力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文化距离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文化距离越大,对外投资成功的可能性越小。

文化距离最先应用在FDI文献中，主要是为了解释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亲密理论认为公司很少投资在文化相距甚远的市场。Yoshino (1976)发现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距离是约束日本在西方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Davidson (1980)认为，除了市场规模、市场的成长性、关税等因素外，美国在加拿大和英国的大量投资主要还是缘于文化上的相近，即文化距离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中国的OFDI与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二）文化相似度

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特性，关系贯穿于我们的整个生活，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系变得日益重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作为跨国业务运营的基础。具有共同的传统与文化的关系网络更容易建立信任，几乎无障碍的沟通也更有利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从而促进业务往来和跨国投资。海外华人关系网络对各国的FDI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关系网络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投资模式。基于种族和家庭的关系网络对中国的跨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特定优势（Erdener and Shapiro, 2005）。当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这种关系网络的存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外市场，合理地进行机会与风险的评估，以减少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起步比较晚，海外华人网络的存在会弥补这个劣势，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会投资到那些有大量华人居住的国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中国的OFDI与华人占东道国人口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指标有OFDI流量和存量两个。OFDI流量反映了中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动态变化，也是受到东道国诸多因素影响的决策变量。OFDI存量数据则显示了中国OFDI在东道国的长期累积过程和当前状态。本文同时选用OFDI流量和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解释变量

1. 文化距离（CD_Hofstede, CD_GLOBE） 不管是采用Hofstede (1980) 的4个文化维度^①（即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不确定规避），还是House等（2004）提出的GLOBE 9个维度，文化距离的测量都是采用Kogut和Singh（1988）提出的方法。就文化维度而言，虽然Hofstede（1980）的文

^① Hofstede的文化维度共有5个，除了文中列出的4个维度以外，还有一个维度是长期导向/短期导向，该指标很多国家的数据不可得，Kogut和Singh（1988）的公式中只取了4个维度。

化维度是受到公认的,但由于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文化的融合,其采用的数据是20世纪70年代,并且只调研了一家公司,应用于现在的研究有一定缺陷并且有点过时。GLOBE的文化维度^①基于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且来自于多家公司,涉及62个国家,与Hofstede的价值维度相比,样本更广泛,数据也较新,更适合对近年研究数据的分析,本文同时采用这两种文化距离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来考察文化距离对FDI的影响。

2. 文化相似度(CP) 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文化相似度的定义不同,Buckley等(2007)的研究采用东道国内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文化相似度这一影响因素的代理变量,并建立虚拟变量,当东道国内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时,取CP=1;否则CP=0。考虑到虚拟变量并不能更详细地描述变量间的关系,本文采用连续变量,对文化相似度的定义仍然选取东道国内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0.01%的取零值。

(三) 控制变量

1. 东道国市场特征 东道国的市场特征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成长越快,FDI的流入越多。很多研究也指出了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市场驱动因素呈现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多地定位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和地区。同时,FDI与市场需求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市场增长速度越快,越能够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因此,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反映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市场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增长率。

2. 政治风险(POLI)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内部化理论预示着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市场导向型的企业会倾向于用出口或许可证贸易的形式来取代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导向型的企业也不愿意以FDI的形式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Buckley等(2007)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实证分析得出FDI流量与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同样采用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来反映其政治风险。

3. 外资开放度(OPEN) 一个国家对待外资的政策越开放,对外资就越有吸引力(Chakrabarti, 2001)。投资政策是体现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如果东道国采取相对较为宽松的投资政策,则会增加其区位优势,从而为国外资本的流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也会增强对国外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本文选取东道国的外资开放度(OPEN)指标,即外资占东道国GDP的比重来客观反映东道国的外资政策。

4. 出口额(EXP) 贸易与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替代关系,还是促进作用,贸易关系尤其是出口对FDI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

^① GLOBE的文化维度共有9个,分别为自信度、未来导向、业绩导向、人性导向、性别差异、规避不确定性、权力范围、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体主义。后5项与Hofstede的研究类似。

了证明(Buckley et al., 2007)。本文选取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EXP)作为控制变量。

5. 汇率水平(ER) 汇率水平会直接影响到贸易和投资。汇率贬值会鼓励出口,但会减少OFDI。有研究表明,母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升值即东道国货币贬值会增加母国对东道国的OFDI(Scott-Green and Clegg, 1999)。故本文选取东道国的汇率水平(ER)作为控制变量。

6. 地理距离(GD) 内部化理论认为,对于寻求市场型的企业,对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出口的方式,而对于较远一些的市场倾向于选择FDI的方式,即FDI与地理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有实证研究表明,1995年、2000年和2002年中国OFDI流量与双边海运距离负相关关系(程惠芳和阮翔,2004)。本文选取中国与东道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表示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7. 是否APEC成员(APEC_dum) 作为APEC经济体内的成员国,相互间的贸易投资行为相比于其他非经济体内成员有更多的有利因素。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东道国是否是APEC成员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APEC_dum作为控制变量。

(四) 数据来源

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文化相似度被定义为东道国内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官方数据库。东道国的政治风险POLI数据来源于《国别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外资开放度(OPEN)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的FDI数据库。中国与东道国的出口额(EX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

表1 变量定义一览表

变量名称	符号表示	定义描述
OFDI 流量	LFDIF	中国每年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额
OFDI 存量	LFDIS	中国当年在东道国的已有对外投资额
文化距离	CD_Hofstede CD_GLOBE	基于 Hofstede 文化四维度的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指数 基于 GLOBE 文化九维度的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指数
文化相似度	LCP	东道国内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比例
国内生产总值	LGDP	东道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LGDPPC	东道国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LGGDP	东道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比上一年的增长率
政治风险	LPOLI	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
外资开放度	LOPEN	外资占东道国 GDP 的比重
出口额	LEXP	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
汇率水平	LER	东道国的汇率水平
地理距离	LGD	中国首都北京与东道国政治或经济中心的空间距离
APEC 成员	APEC_dum	东道国为 APEC 成员, 则取值 1, 否则取 0

计年鉴》。东道国汇率水平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地理距离(GD)计算的是中国首都北京与世界各国政治或经济首都之间的空间距离,通过www.geobytes.com提供的距离测量工具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样本数据选择

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①我们选取2006~2010年为样本区间。样本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主要依据以下原则:即在样本区间内,在具有文化维度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选取每年均有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经过上述处理,采用Hofstede文化四维度测度方法,最终获得4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采用GLOBE文化九维度测度方法,最终获得4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

(二) 模型与分析

本文的实证采用一系列多元线性回归的对数线性模型,对相应的变量作了自然对数的转换处理,同时引入4个虚拟变量以控制年份上的差异,计量分析软件采用Stata/SE 12.1。模型1~3以LFDIF为因变量,模型4~6以LFDIS为因变量。模型1和4是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描述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与文化距离和文化相似度的关系;模型2和5是在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与文化距离和文化相似度的关系;模型3和6则是剔除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变量后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与文化距离和文化相似度的关系。

表2 变量统计性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均值	方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LFDIS	9.60	2.19											
LFDIF	9.83	1.08	0.76*										
CD_													
Hofstede	2.22	1.31	-0.31*	-0.20*									
LCP	0.66	1.11	0.54*	0.55*	-0.41*								
LGDP	26.57	1.43	0.35*	0.15*	0.22*	-0.11							
LGDPPEC	9.50	1.36	-0.02	0.17*	0.72*	-0.01	0.36*						
LGGDP	2.51	0.40	-0.03	0.00	-0.33*	-0.16*	-0.19*	-0.37*					
LPOLI	2.06	0.19	0.09	0.24*	-0.17*	0.22*	-0.07	0.12	0.10				
LOPEN	6.26	0.09	-0.11	0.11	0.05	0.04	-0.19*	0.13	-0.04	0.07			
LEXP	13.29	2.13	0.47*	0.38*	0.10	0.32*	0.55*	0.40*	-0.18*	0.01	-0.01		
LER	2.04	2.83	0.03	-0.06	-0.45*	-0.01	-0.24*	0.64*	0.2*	-0.11	-0.13*	-0.18*	
LGD	8.94	0.54	-0.14*	-0.07	0.22*	-0.24*	0.07	0.25*	-0.03	0.04	0.07	-0.00	-0.24*

说明:*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① 中国FDI数据在2005年及以前数据为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数据,2006~2010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含金融类)。

表2显示了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及变量间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看到,FDI与文化距离负相关,并且FDI存量与文化距离的负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他控制变量中也有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存在多重共线性可能。进行方差膨胀系数(VIF)检验得出变量LGDPPC的VIF值偏大,剔除变量LGDPPC后,VIF值均小于2.8,基本解决了共线性问题,保证了模型估计的无偏性和一致性。

(三) 检验结果与讨论

基于Hofstede和GLOBE两种不同的文化距离维度模型,我们分别对假设检验的结果进行讨论。基于Hofstede的文化距离维度模型(如表3所示),在模型1~3中,FDI流量与文化距离的关系都是不显著的,但是FDI流量与文化相似度的正向关系是基本显著的,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影响中国的FDI流量。在模型4~6中,FDI存量与文化距离的负向关系是成立的,并且在模型4中进行直接回归、在模型6中加入控制变量和排除共线性后的结果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FDI存量与文化相似度的关系在3个模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正向关系都是显著的。由此,假设1与2都只得到了部分验证。Hofstede文化距离与FDI存量和流量的关系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讨论:

1. FDI流量与文化距离关系的不显著性(模型1~3) 在局部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趋同与文化异化是同时存在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文化的趋同,这使得国际商务活动中文化这一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此,在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市场进入决策时,文化因素将不再被视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2. FDI存量与文化距离关系的显著性(模型4、6) 尽管文化日益具有趋同性,但文化异化趋势存在仍会持续影响和加剧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使得文化因素变得依然重要,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成本,尤其对于全资和合资企业而言,管理东道国的劳动力和维护良好的供应商、消费者和政府关系都会由于文化的差异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从跨国公司的长期投资和海外市场的运营和管理来看,文化因素仍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3. FDI存量与文化距离关系的不显著性(模型5) 国家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动态性,并且Hofstede文化距离维度与由人均GDP衡量的国民财富成曲线相关关系(Tang and Koveos, 2008)。由于表2中的变量相关性,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2,因此人均GDP这一经济因素基本上已经解释考虑对外投资中文化差异性的原因,因此在模型5中,CD_Hofstede与LGDPPC的共线性问题导致FDI与文化距离关系是不显著的。

表3 FDI与文化双因素关系的检验结果 (Hofstede文化距离维度)

变量	LFDIF	LFDIF	LFDIF	LFDIS	LFDIS	LFDI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YEAR_2007	0.3523* (0.1836)	0.3584** (0.1696)	0.3765** (0.1696)	0.9555*** (0.3583)	0.8734*** (0.2989)	0.8173*** (0.3018)
YEAR_2008	0.3962** (0.1836)	0.3519** (0.1728)	0.3624** (0.1731)	1.2753*** (0.3583)	1.0414*** (0.3044)	1.0090*** (0.3080)
YEAR_2009	0.5014*** (0.1836)	0.4389** (0.2229)	0.3828* (0.2200)	1.6777*** (0.3583)	1.1551*** (0.3927)	1.3291*** (0.3915)
YEAR_2010	0.8459*** (0.1836)	0.7809*** (0.1701)	0.8030*** (0.1698)	2.1907*** (0.3583)	1.9966*** (0.2996)	1.9281*** (0.3021)
CD_Hofstede	0.0235 (0.0489)	-0.0948 (-0.0791)	-0.0139 (0.0556)	-0.1785* (0.0954)	-0.0534 (0.1394)	-0.3042*** (0.0989)
LCP	0.5530*** (0.0577)	0.6005*** (0.0809)	0.6415*** (0.0759)	0.9815*** (0.1126)	1.2205*** (0.1426)	1.0933*** (0.1350)
LGDP		0.1748*** (0.0545)	0.1895*** (0.0537)		0.6809*** (0.0960)	0.6351*** (0.0955)
LGDPPEC		0.1271 (0.0888)			-0.3942** (0.1564)	
LGDP		-0.0185 (0.2125)	-0.1178 (0.2014)		-0.5169 (0.3745)	-0.2091 (0.3584)
LPOLI		0.4709 (0.3198)	0.6215** (0.3027)		0.2901 (0.5633)	0.1771 (0.5387)
LOPEN		1.6095** (0.6475)	1.7279*** (0.6438)		-0.1794 (1.1408)	-0.5466 (1.1458)
LEXP		0.0334 (0.0365)	0.0445 (0.0358)		0.1169* (0.0644)	0.0826 (0.0638)
LER		0.0609** (0.0260)	0.0491** (0.0247)		0.0478 (0.0458)	0.0844* (0.0440)
LGDP		0.1202 (0.1125)	0.1581 (0.1097)		0.3926 (0.1982)**	0.2753 (0.1952)
APEC_dum		-0.5135*** (0.1476)	-0.5334*** (0.1473)		-0.4381* (0.2601)	-0.3765 (0.2622)
Constant	8.9929*** (0.1831)	-9.0689* (4.7488)	-9.7167** (4.7391)	8.1349*** (0.3573)	-9.6414 (8.3664)	-7.6326 (8.4339)
N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R-square	0.3702	0.4948	0.4898	0.4140	0.6170	0.6054
Adj R-square	0.3529	0.4585	0.4558	0.3978	0.5895	0.5790

说明: ***,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每一格第二行括号内为标准差。

基于GLOBE的文化距离维度模型 (如表4所示), 在模型1~3中, FDI流量与文化距离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FDI流量与文化相似度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在模型4~6中, FDI存量与文化距离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FDI存量与文化相似度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由此, 假设1与2均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由于一般将Hofstede文化维度用于国际商务文献中都没有考虑长短期导向, 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本文也只用了4个维度。相比于Hofstede文化距离维度, GLOBE维度下的文化距离与FDI流量和存量的关系的显著性一方面体现了GLOBE文化维度相对于Hofstede文化维度的优势, 即GLOBE文化维度体现了未来导向和业绩导向的因素, 提供了最新的和最全面的文化维度(Tang and Koveos, 2008); 另一方面也充分

体现了对外投资决策中对长期导向因素的重视与考虑以及在对外长期投资的运营和管理上对文化因素更为全面的关注。

由表3和表4中的文化相似度与FDI流量和存量的显著正向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因素相对于文化距离而言,对FDI流量和存量的影响更大,也更明显。以表3中的模型3和模型6为例,如果华人华侨占东道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增加到2%,中国对东道国的FDI流量将增长63.15%,FDI存量将增长109.33%。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当他们在海外华人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实际上其关系资产也构建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Buckley et al., 2007)。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投向当地华人人口比例相对较大的国家,因此,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4 FDI与文化双因素关系的检验结果(GLOBE文化距离维度)

变量	LFDIF				LFDI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YEAR_2007	0.2951* (0.1647)	0.2642* (0.1461)	0.2721* (0.1458)	0.5753* (0.3249)	0.4735* (0.2653)	0.4878* (0.2648)
YEAR_2008	0.2939* (0.1647)	0.2410 (0.1501)	0.2598* (0.1488)	0.9200*** (0.3249)	0.8397*** (0.2726)	0.8738*** (0.2702)
YEAR_2009	0.4139** (0.1647)	0.3399* (0.1802)	0.3743** (0.1766)	1.2929*** (0.3249)	1.0857*** (0.3273)	1.1483*** (0.3206)
YEAR_2010	0.6525*** (0.1647)	0.6487*** (0.1474)	0.6558*** (0.1472)	1.7598*** (0.3249)	1.7828*** (0.2676)	1.7956*** (0.2673)
CD_GLOBE	-0.0864* (0.0444)	-0.1704*** (0.0474)	-0.1741*** (0.0472)	-0.2207** (0.0877)	-0.2823*** (0.0861)	-0.2889*** (0.0858)
LCP	0.5523*** (0.4964)	0.5895*** (0.0719)	0.6331*** (0.0555)	0.9656*** (0.0980)	0.9696*** (0.1305)	1.0488*** (0.1008)
LGDP		0.1199* (0.0642)	0.1700*** (0.0370)		0.5367*** (0.1165)	0.6275*** (0.0672)
LGDPPEC		0.0484 (0.0528)	0.0489 (0.0528)		-0.2919*** (0.0959)	-0.2911*** (0.0958)
LGGDP		-0.0670 (0.1578)	-0.0670 (0.1577)		-0.3007 (0.2864)	-0.3007 (0.2864)
LPOLI		1.0333*** (0.2623)	0.9762*** (0.2553)		1.3349*** (0.4763)	1.2311*** (0.4636)
LOPEN		1.2624 (1.4508)	1.2774 (1.4504)		7.8644*** (2.6341)	7.8915*** (2.6334)
LEXP		0.0520 (0.0545)			0.0944 (0.0990)	
LER		0.0801*** (0.0243)	0.0818*** (0.0242)		0.1378*** (0.0441)	0.1410*** (0.0440)
LGD		0.5931*** (0.1256)	0.5714 (0.1235)		0.9507*** (0.2280)	0.9113*** (0.2242)
APEC_dum		-0.2589* (0.1531)	-0.3138** (0.1419)		-0.0018 (0.2780)	-0.1015 (0.2576)
Constant	9.4679*** (0.1958)	-9.8250 (9.2922)	-10.2673 (9.2787)	8.9871*** (0.3865)	-63.3835*** (16.8713)	-64.1864*** (16.8467)
N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R-square	0.4339	0.5793	0.5775	0.4245	0.6382	0.6366
Adj R-square	0.4183	0.5490	0.5492	0.4087	0.6121	0.6123

说明: ***,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每一格第二行括号内为标准差。

六、结论与启示

与之前的针对FDI诸多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本文旨在研究单一文化因素对FDI的潜在作用并且更全面地考虑了文化双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选取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增长的2006~2010年为样本区间,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双因素即文化距离与文化相似度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及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流量和存量与GLOBE文化距离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Hofstede文化距离的相关性并不完全显著;但是FDI的流量和存量与文化相似度的正向关系在两种情况下都很显著。从更全面文化因素的视角看,我们不仅看到了GLOBE文化维度相比于Hofstede文化维度在研究FDI中更为全面和适用性更强,而且也看到了文化因素中文化相似度与文化距离相比对中国FDI的影响意义更大。

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化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给了我们如下启示:

(1)文化距离对FDI流量与存量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文化距离对FDI流量的影响不显著时,对FDI存量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对FDI流量的影响显著时,其显著的影响程度较之对FDI存量的影响也是偏小的。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这种对FDI流量与存量的影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距离对FDI的持续和长效性比对短期的FDI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大。

(2)在考虑FDI决策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距离维度都起作用。Hofstede文化维度(除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外)对FDI流量并无显著作用,但GLOBE文化维度对FDI的负向作用却是显著的,这说明GLOBE文化维度中区别于Hofstede文化维度的因素(自信度、未来导向、业绩导向、人性导向)对FDI的影响作用可能更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引起关注。

(3)GLOBE文化维度不仅是在FDI的研究中,而且在其他国际商务活动研究中也可能比Hofstede文化维度适用性更强,因为它考虑的维度更为全面,而且数据也更更新、更接近于当前的现实状况。文化的动态性也使国际商务领域更迫切地需要一种更新的文化维度。

(4)降低交易成本和关系网络效应对吸引中国投资者很重要,海外华人华侨对拉动中国FDI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关系资产构建了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也是其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全球文化融合加大了这一文化因素对FDI的影响,同时也逐步渗透到其他的国际商务活动中,应该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 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4,27(11).
- [2] 田晖,蒋辰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3).

- [3] 张宏, 王建. 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 (6).
- [4] Benito, G. R. G. and Gripsrud, G.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Discrete Rational Location Choices or a Cultural Learning Proces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3).
- [5] Buckley, P. J.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4, 2(1).
- [6] 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 [7] Chakrabarti, A.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J]. Kyklos, 2001, 54(1).
- [8] Davidson, W. H.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 11(2).
- [9] Erdener, C. and Shapiro, D. 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Dunning's Eclectic MNE Paradigm[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
- [10] Flores, R. G. and Aguilera, R. V. Globaliza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An Analysis of US Multinational Firms in 1980 and 2000[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7).
- [11] Li, J. and Guisinger, S.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 Multinationals in the "Triad" Regions: Japa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4).
- [12] Loree, D. W. and Guisinger, S. 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26(2).
- [13] Randøy, T. and Dibrell, C. C. How and Why Norwegian MNCs Commit Resources Abroad: Beyond Choice of Entry Mode[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2, 42(2).
- [14] Scott-Green, S. and Clegg, J. The Determinants of New FDI Capital Flows into the EC: A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the USA and Japan[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99, 37(4).
- [15] Tang, L. and Koveos, P. E. A Framework to Update Hofstede's Cultural Value Indices: Economic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6).
- [16] Thomas, D. E. and Grosse, R. 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Mexico[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1, 7.
- [17] Yoshino, M. Y. Japan'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ultural Dual-factor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 Yuan-xu YAO Ming-hui

Abstrac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ual factors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flows and stocks are from 2006 to 2010 examined for the sample interval. For th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distance, the frameworks of Hofstede and GLOBE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It is found that FDI flows have no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Hofstede cultural distance but relates negatively to GLOBE cultural distance. However, FDI stocks present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with both Hofstede cultural distance and GLOBE cultural distance. FDI flows and FDI stocks have shown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al proximity.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factors, compared to the Hofstede's framework, GLOBE is more applicable for FDI research, and compared to the cultural distance, cultural proximit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 China; FDI; cultural distance; cultural proximity

(责任编辑: 张建华)